



The Localization Strategies of *Kanji* (Chinese Characters) and *Kanbun* (Chinese Writings) in Pre-Modern Japan

Benjamin Wai-Ming Ng

Abstract: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Chinese characters (*kanji*) have had a strong impact on the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To this day, the Japanese use more Chinese characters than any other non-Chinese communities. *Kanji* was introduced to Japan by Chinese and Koreans before the earliest written records in Japanese history, but there was no evidence that pre-historical Japanese studied *kanji* seriously. The earliest record of *kanji* in Japan was the letter of gratitude sent to the Wei court in China by the Japanese female leader Himiko in a.d.240. In the sixth century, Paekche scholars and monks came to Japan to lecture and promote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in the Yamato court. During the Nana (710 – 794) and Heian (794 – 1192) periods, courtiers were keen to use Chinese (*kanbun*). Chinese books, Japanese envoys to Tang China, Japanese scholar-monks, naturalized Chinese or Koreans, the Imperial college and Buddhism all helped to popularize *kanbun*. The official documents were written in *kanbun* including *the Twelve Level Cap and Rank System*, *the Seventeen-Article Constitution* and *the Nihon Shoki* (Japanese Chronicles). In medieval times, Zen Buddhist monks and courtiers studied Chinese texts and composed Chinese poems. With the ris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Edo period, Japanese scholars were equipped with the ability to read and write in Chinese. For a long time, with the extensive use of *kanji* and *kanbun*, Japan was regarded as a member of the Sinosphere, as par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circle. This view is one-sided and has overlooked the fact that the Japanese use *kanji* and write *kanbun* in their own unique way: their characters, meanings, functions, syntax and the language environmen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standard Chinese. Although Japan joined the Sinosphere, it localized the Chinese characters to enhance the Japanese language. *Kanji* and *kanbun* were no longer standard Chinese, but a hybrid Sino-Japanese language form. They were the product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Japanese history. Based on primary Japanese sources, this article will discuss how the Japanese used different localization strategies to turn Chinese characters into a part of the Japa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from the Nara-Heian period to the Tokugawa period. Strictly speaking, this is not a study of Japanese linguistics, but a cross-cultural study of Sino-Japanese exchange in languages.

Keywords: *kanji*, *kanbun*, Japanese, localization,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Author: Benjamin Wai-Ming Ng received his doctorate from the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in 1996. He is a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and chair of the Japanese Studies Department,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i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history of Sino-Japanese cultural exchange and history of East Asian Yijing studies. His major publications include *Imagining China in Tokugawa Japan (English)*,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English)*, *Dechuan Riben de Zhongguo Xiangxiang (Chinese)* and *Dongya Yixue Shilun.(Chinese)*.



近代以前日本的漢字、漢文當地語系化策略

吳偉明



[摘要]從文化角度看，漢字對日本語及日本文化影響甚大，日本至今仍是使用漢字最多的非華人地區。在日本信史以前，漢字已隨中國人、朝鮮人傳入，但當時日本人似乎並無認真學習。在文獻上，日本人最早使用漢字的記載是公元240年女王卑彌呼向中國的魏齊王曹芳“上表答謝恩詔”。公元6世紀，百濟學者及僧侶多次到日本講學，在大和朝廷推廣漢文。到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時期，朝廷的貴族及公卿使用漢文成風，漢籍、遣唐使、留學僧、歸化人、大學寮及佛教均有助於普及漢文。朝廷官方文書亦用漢文書寫，如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十七條憲法》及舍人親王等人所撰的《日本書紀》均用漢文。在中世，禪僧及公卿熟讀漢籍，精

通漢詩。到了近世，儒學冒起，日本學者基本上都能閱讀漢籍及用漢文書寫。然而，長期以來，日本人這種使用漢字、讀寫漢文形態，容易被學術界解讀為，日本被納入漢語世界，成為漢字文化圈的一員。但是，持此觀點者，祇是看見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面而已。人們容易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即歷代日本人對漢字、漢文的使用，與中國人的使用迥然不同。這種中文的日本化現象，可以從字形、字義、功能、語序、語境等方面反映出來。日本人使用的漢字、漢文，其實已完全被當地語系化了。為此，從奈良、平安到德川（1603—1868）時期，日本人先後採取了將漢字作為日語註音符號、以漢字為基礎創造假名、日式訓讀、用漢字寫日式漢文、自創漢字及成語、改變漢字的字體、漢字新解等七種策略。這些策略，到近世最終完成。至此，日本化的漢字，已成為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人按日語思維組成並使用的漢文，也是一種中日混合的文體，與中國的漢語差異甚大。從本質上說，如今日本的漢字，不再是從中國輸入的純正文字，而是中日混合的雜種文字。它外表雖像中文，內涵卻多是日本的東西。當然，漢字作為日本人建立日本語過程中的素材，也是中國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中一直扮演的角色。

[關鍵詞] 漢字 漢文 日文 當地語系化 中日文化交流

[作者簡介] 吳偉明，1996年在普林斯頓大學獲文學博士學位，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日文化交流史及東亞易學史研究，代表性中文著作有《東亞易學史論》《德川日本的中國想象：傳說、儒典及詞彙的在地化詮釋》，英文著作有 *Imagining China in Tokugawa Japan, 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等。

前言

日本人稱日本語中的中文字為“漢字”，以別於中國人使用的中文字。^①中國人在元代以前一般不會稱中文字為漢字。^②除日本外，在歷史上中國周邊一些國家亦使用漢字，現代學術界將它們統稱為“漢字文化圈”(Chinese character cultural sphere或Sinosphere)。^③由於日本不在中華朝貢體系之內，因此，人們多以日本為此圈的外圍成員。^④這是基於政治、外交層次的分類。然而，若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日本毫無疑問是核心成員，漢字對日本語及日本文化影響甚大。日本至今仍是使用漢字最多的非華人地區。

對日本人而言，漢字是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由漢字按日語思維組成的漢文是一種中日混合文體，不同於中國的中文，所以不應以中文純正與否的角度加以評價。^⑤中日文化交流纔是研究漢字、漢文本質的重點所在。歷代日本人對漢字的使用與中國人不同。這種將中文據為己用的文化現象，是由日本歷代不斷將漢字、漢文當地語系化所形成的結果。本研究以歷代日本文獻為基礎，探討從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至德川(1603—1868)時期漢字如何被納入日本語及日本文化體系中，成為中日混合的文字。嚴格而言，本研究不屬語言學，而是以中日文化交流史為視角的域外漢字文化學研究。

一 漢字傳入日本

日本是漢字文化圈的重要成員。漢字在日本信史以前已隨中國人、朝鮮人傳入，但日本人最初似乎並無認真學習。《日本書紀》(720)謂，在應神天皇統治的第十六年(286)，百濟博士王仁帶來《論語》《千字文》。^⑥不過，漢字傳入日本的時間應更早。在公元1世紀左右，漢朝廷與日本九州的一些地方部落政權已有來往，而且有不少中國及朝鮮移民集團移居日本。這時，漢字無疑已傳入日本，考古方面亦支持此看法。日本各地出土了不少刻有漢字銘文的漢魏刀劍及銅鏡，連日本人仿製的銅鏡亦多添加漢字做裝飾。^⑦在文獻上，日本人最早使用漢字的記載來自《三國志·魏書》。在魏齊王曹芳正始元年(240)，日本女王卑彌呼向魏帝“上表答謝恩詔”^⑧。《宋書·倭國傳》記，升明二年(478)，日本雄略天皇給中國南朝宋帝上表，其漢文正確自然，估計出自渡來人之手。公元6世紀，百濟學者及僧侶多次到日本講學，在大和朝廷推廣漢文。

奈良、平安朝廷的貴族及公卿使用漢文成風。漢籍、遣唐使、留學僧、歸化人、大學寮及佛教均有助於普及漢文。朝廷官方文書亦用漢文書寫，如聖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階》(603)、《十七條憲法》(604)及舍人親王等人所撰的《日本書紀》均用漢文。

中世禪僧及公卿熟讀漢籍，精通漢詩。近世儒學冒起，日本學者基本上都能閱讀漢籍及用漢文書寫。不過，日本人使用的漢文不是純正中文，而是一種中日混合的文體。表面上看，是日文被中文化，其實是中文被日本化。漢字在日本經過當地語系化的洗禮後，成為日文及日本文化的

- ① 日本最早使用“漢字”一詞的文獻是南北朝末期的《庭訓往來》，內有“梵字漢字達者”的文字記錄〔日〕石川松太郎編：《庭訓往來》(東京：平凡社，1973)，第101頁。
- ② “漢字”一詞在中國最早使用的文獻是《元史·兵志》，謂蒙古人稱中文為漢字，以區別於新造的蒙古字及回回字(回族字)。原文曰：“造蒙古、回回、漢字文冊以聞，其總數概不可知也。”參見〔明〕宋濂：《元史》，第9冊，收錄在劉曉東編：《二十五別史》(濟南：齊魯書社，2000)，第17冊，第151頁。
- ③ 最早使用“漢字文化圈”是日本語言學者河野六郎的《日本語の歴史2：文字とのめぐりあい》(東京：平凡社，1963)。另一語言學者龜井孝在1948年提出相近的“漢語文化圈”〔日〕龜井孝：“日本語の現状と述語”，《思想の科学》(1948)，第3—9頁。
- ④ 例如，黃枝連指出，日本非天朝禮儀世界的成員，在吸收儒學時不受任何規範〔黃枝連：《天朝禮禮體系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中冊，第8頁〕。
- ⑤ John Timothy Wixted, “Kanbun, Histories of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Japanologists”, *Sino-Japanese Studies* 2 (1998): 23—31. 漢文在韓國、越南等地亦出現不同程度的本地化〔Peter Kornicki, “A Note on Sino-Japanese: A Question of Terminology”, *Sino-Japanese Studies* 17 (2010): 29—44〕。
- ⑥ 此說並不可靠。《千字文》成書於公元6世紀初，因此不可能在應神天皇時傳至日本。
- ⑦ Christopher Seeley, *A History of Writing in Japan* (Leiden: E.J. Brill, 1991), 9-39.
- ⑧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第847頁。

一部分。這種將漢字、漢文在日本當地語系化的策略可以歸納為七種。這一過程開始自奈良、平安，在近世基本完成。

二 漢字表日文音

漢字、漢文在日本當地語系化的第一種策略是，使用漢字做日語的註音符號。中文本是表意文字，古代日本人已將它作表音文字使用。日本語本無字，祇有音。漢字傳入後，日本人借漢字標音，是為音假名。這些漢字是祇用其聲，與本身的字義無關。例如，“草”的日語發音為“くさ(kusa)”，古代日本人用發音相近的漢字“久佐”來代表。這種借漢字標音的做法並非由日本人發明，中國人在公元3世紀撰寫的《魏書·東夷傳》已借用漢字標音，如“邪馬台”“卑彌呼”等。日本人可能受其啓發，而且發揚光大，不再局限於人名及地名，成為一種表音文體。

日本人早在信史之始已使用漢字作日語註音符號。一些出土的公元5世紀的劍、鏡刻有漢字標音的人名及地名。大阪難波宮迹出土的一個公元652年的木簡上有和歌“皮留久佐乃皮斯米之刀斯”，讀作日語為“はるくさのはじめのとし”，意即“春天是草開始生長的季節”。^①

日本人在奈良時代使用一套指定的漢字，假借其發音表記日文詩歌，發展成為萬葉假名。^② 在平假名、片假名尚未出現之前，萬葉假名是日本人使用的唯一音標系統。萬葉假名在奈良時代相當流行，連翻譯從唐輸入的佛典時亦使用萬葉假名。例如，奈良後期，僧人信行在翻譯《大般若經音義》時使用萬葉假名做和訓。公元8世紀成書的《萬葉集》，混合使用萬葉假名及部分真漢文。以《萬葉集》記大伴旅人(665—733)的和歌一首為例：

余能奈可波 牟奈之伎母乃等 志流等伎子 伊與余麻須萬須 加奈之可利家理
世の中は空(むな)しきものと 知る時しいよよますます 悲しかりけり(日文)
人生虛無，明此理時倍感悲傷(中譯)。^③

同一個日文，不時出現多個萬葉假名。以“山”(やま, yama)為例，《萬葉集》使用“八萬”“也末”“野麻”三種萬葉假名。

《古事記》(712)使用的文體亦是混入萬葉假名的準漢文，漢字作示意(訓)或註音(音)一起使用。^④根據作者太安萬侶的解釋，純用漢字訓寫難達意，純用漢字註音又嫌冗長，結果是結合兩者。他在序文表示：“上古之時，言意並朴，數文構句，於字即難。已因訓述者，詞不逮心。全之音連者，事趣更長。是以今或一句之中，交用音訓。”^⑤平安中後期的《伊呂波歌》(1079)亦用萬葉假名寫成。全文由日語的四十七音所組成，可謂是首字母歌。萬葉假名中常用的數十個表音漢字，後來演變成平假名、片假名。平假名、片假名誕生後，萬葉假名便被取代。

近世日本學者對萬葉假名有頗多研究，並借語言歌頌日本文化。^⑥契沖(1640—1701)在《萬葉代匠記》(1690)註釋《萬葉集》的古詩，旁徵博引，為萬葉研究奠下基礎。賀茂真淵(1697—1769)在《萬葉集大考》(1760)中強調，日本古代詩歌反映真心及大和魂，因為表音文字勝於表意文字，日語五十音優於中文字三萬八。本居宣長(1730—1801)受真淵的影響，作《萬葉集玉小琴》補充《萬葉集大考》。他喜歡以萬葉假名寫成的《古事記》多於用純漢文撰寫的《日本書紀》。他在《漢字三音考》主張，日語五十音是“皇國正音”，勝於中文及梵文。

另一種用漢字標日本音的文體叫“宣命體”。奈良、平安朝的天皇口述命令等公文，習慣用全漢字的宣命體書寫。宣命體全文雖用漢字，但文法結構仍依據日文。例如，句子當中的助詞

① [日]名兒耶明：《書の見方：日本の美と心を読む》(東京：角川學藝，2008)，第63頁。

② 日本人選用數十漢字，每個漢字均代表一個日語音節。萬葉假名意即將漢字作假名用。

③ 陸曉光：“漢字傳入日本與日本文字之起源與形成”，《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2002)：93。

④ David Pollack, *The Fracture of Meaning: Japan's Synthesis of China from the Eighth through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15-54.

⑤ [日]山口佳紀、神野志隆光註：《古事記》(東京：小學館，1997)，第16頁。

⑥ Peter Nosco, “Man' yōshū Studies in Tokugawa Japan”,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n Society of Japan*, 4 (1986): 10-146.

用法是採用日文的行文方式。^①萬葉假名及漢字同一大小為宣命大書體，將萬葉假名寫成靠右小字為宣命小書體。以《續日本記》(772)所載孝謙天皇(718—770)在757年所頒詔書中的一句為例：“天乃賜倍留大奈留，瑞乎頂爾受賜波理”〔天(あめ)の賜(たま)へる大(おほい)なる、瑞(しるし)を頂(いただき)に受賜(うけたま)はり〕。^②此句譯成中文是：“天賜大哉，願受其所賜祥瑞。”文中小字全屬用萬葉假名來表示日文助詞，“乃”代表“の”，“倍留”“奈留”“波理”分別是日文“へる”“なる”“はり”的類似發音。“乎”“爾”是“を”“に”。日本古代及中世一些佛僧、神官、陰陽師的祭文亦用宣命體。宣命體一直至近世仍有人使用。例如，國學者秋山光彪(1775—1832)於1827年用宣命體為其師村田春海(1746—1811)撰寫墓誌銘。

三 漢字造假名

漢字、漢文在日本當地語系化的第二種策略是，以漢字為基礎創造假名。假名分為平假名、片假名，均始於公元8世紀中葉的平安前期。以草書書寫的萬葉假名後來演變成平假名。平假名的“あ、い、う、え、お”來自“安、以、宇、衣、於”，傳說是入唐學問僧空海(774—835)受梵文字母拼寫原理所啟發，將漢字草書簡化為平假名。國學者伴信友(1773—1846)在《假字本末》謂：“空海僧都，以草體為假名，定四十七音字體。”^③不過，此說未必可信，假名應是集體智慧累積的成果。平安時期出現女性作家的平假名文學，代表作是紫式部的《源氏物語》、清少納言的《枕草子》。這些假名文學亦會夾雜少量漢字。平安時期亦出現“假名書法”，書法家多是男性。例如，用純假名創作《土佐日記》的紀貫之(868?—945)是有名的假名書法家。

此外，平安學者將漢字的一部分分拆出來標註漢字的發音，成為片假名。片假名的發明最初是為用於訓讀漢字的符號，多認為吉備真備(695—775)是創作者。^④片假名的“ア、イ、ウ、エ、オ”簡化自“阿、伊、宇、江、於”。^⑤在四十六音中，平假名、片假名演化自相同漢字共三十個。平假名一般作書寫用，片假名最初為僧侶讀經時記音所用。兩者並用亦有，如公元897年宇多天皇抄寫的《周易抄》，除漢字外，還附加平假名的註釋及片假名的訓點。

中世以降，日本人的文章大多兼用漢字與片假名(如《今昔物語集》)，但亦有純漢字(如官方文書)、純假名(如能劇的劇本)的文體。在庶民之間流行的假名文學有室町時代的御伽草子，以及近世的假名草紙及浮世草紙。

日本近世國學者好以假名寫文章，以對抗儒者崇拜漢文之風。荻生徂徠(1666—1728)認為，漢字表音亦表意，勝於祇表音的假名。這正是國學者最不認同之處。國學家契沖、賀茂真淵、本居宣長均貶漢字而高舉假名，認為漢字帶漢意，流於虛偽及私意，假名卻有“言靈”“和魂”，帶有宗教性的力量。^⑥國學者將本源於漢字的假名作為日本的傳統文字，與漢字對立。真淵表示，日本人使用日文口語已足夠，根本無需漢字：“此國人心直，事言少，言無惑。聞忘之事無，言而無惑。得善聞，遠久不忘而久傳。民心直，君御法少。間有詔時，如風般四方之國響應，如水般通民心。然而有此，天之益人，以語相繼無誤，久而無違。何須用字？”^⑦

四 漢文訓讀

漢字、漢文在日本當地語系化的第三種策略是，以日式訓讀法閱讀漢文。除仿中國發音的音

① 有謂“宣命體”可能來自古代朝鮮的吏讀〔日〕大島正二：《漢字伝来》(東京：岩波書店，2006)，第117頁〕。

② 〔日〕北川和秀編：《續日本紀宣命：校本・総索引》(東京：吉川弘文館，1982)，第110頁。

③ 〔日〕伴信友：《假字本末》，收入福井久藏編：《國語學大系・文字一》(東京：厚生閣，1939)，第209頁。

④ 〔日〕新井白石：《同文通考》，第3卷，第1—3頁，國文學研究資料館電子版(請求記號W811-38)。有謂吉備真備受唐朝樂譜啟發而創片假名(曹定雲：“日文‘假名’源於唐代樂譜與草書”，《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10-15)。

⑤ 有關假名的演化史，參見Seeley, *A History of Writing in Japan*, 60-125。

⑥ 王小林：《從漢才到和魂：日本國學思想的形成與發展》(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第35—70頁。

⑦ 〔日〕正宗敦夫編：《賀茂真淵集》(東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會，1929)，第224頁。

讀外，日本人亦用日中混體的訓讀法。日本人在閱讀漢文時，添加“を、こと、に、して”等助語詞，一般用片假名，依日語文法解讀漢文。^①因為，在字的周圍加上“乎古止點”(を、こと)及返點(如レ、一二、上下、甲乙等)以輔助訓讀，所以亦稱訓點。

在奈良時代，僧人已開始將漢文佛典譯成萬葉假名，並加以訓讀，這是日本訓讀漢文的起源。大學寮亦用訓讀學習漢籍。《續日本記》留下日本人對《文選》《管子》的訓讀文。平安末期，訓讀已普及於貴族、僧侶之間。^②

訓讀在日本中世、近世隨漢籍傳播而大盛。以《孟子》的“魚我所欲也”為例，訓讀為“魚(うお)我(わが)欲(ほつ)す所(ところ)なり”。漢文訓讀在不同時代有其變化。以中文“不得已”的訓讀為例，平安用“不得已”(やむことえず)，中世為“止事ヲ不得シテ”(やむことをえずして)，近世作“やむことを得ず”。近代“やむことをえず”“やむをえず”混用，現代專用“やむをえず”。^③

日本近世學者將中國“四書五經”加訓點(和訓)以輔助一般人閱讀漢籍。訓讀成為近世漢文教育的基礎。單是《周易》註疏便出現最少二十六種和訓，其中以文之玄昌、藤原惺窩、林羅山、山崎闇齋、松永寸雲的標點為代表。藤原版《易傳》、林版《周易本義》、山崎版《周易本義》《易學啓蒙》因為成為官版而廣泛流傳。^④荻生徂徠批評漢文訓讀法令古意失真，主張漢詩文要用唐音音讀^⑤，因而近世中期一度興起唐音讀漢詩之風^⑥。不過，此做法門檻太高，連徂徠的高足太宰春臺(1680—1747)亦認為太難。

漢文訓讀形成的文體稱漢文訓讀體，是變體漢文的一種，常見於日本中世說話集、軍記物語及近世文章。漢文訓讀體是漢字混合假名的一種翻譯體，可以還原成類似中文的文言文。漢文訓讀體在明治時期(1868—1912)成為官方語，以《教育敕語》首句為例：“朕惟フニ、我力皇祖皇宗、國ヲ肇ムルコト宏遠ニ、徳ヲ樹ツルコト深厚ナリ。”^⑦文部省漢譯為“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國宏遠，樹德深厚。”

五 變體漢文

漢字、漢文在日本當地語系化的第四種策略是，變體漢文(或稱和化漢文、和式漢文)。文章雖用漢字，但卻混入日文語法及詞彙(和臭或和習)，因此，它並非正統的中文。^⑧變體漢文出現於奈良時期，表面上是中文，但語言結構與思路卻是日文。聖德太子的《法華義疏》有不少變體漢文，如首句“此是大委国上宮王私集非海彼本”讀作“此れは是れ、大委国(やまとのくに)の上宮王(かみつみやのおおきみ)の私の集にして、海の彼(かなた)の本にあらず”，漢譯為“大和國聖德太子自著，非海外之書也。”^⑨奈良法隆寺的《金堂藥師如來像光背銘》(607)亦用變體漢文寫成，全文祇有九十字，記載用明天皇製造如來像的緣由如下：“我大御病太平欲坐故，將造寺藥師像作仕奉詔”(漢譯：我患大病，欲得太平，建寺供奉藥師像)。^⑩“藥師像作”是日語結

① 韓人的釋讀類似日本人的訓讀。越南、蒙古、契丹亦有漢文訓讀。金文京統稱亞洲用漢文訓讀的地區為“訓讀文化圈”〔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東京：岩波書店，2010)〕。

② [日]小林芳規：《平安時代の佛書に基づく漢文訓讀史の研究：第一冊 敘述の方法》(東京：汲古書院，2011)。

③ 孫娜：“從古漢語的‘不得已’到日語的‘やむをえず’”，《中國古典文學研究》13(2016)：72—81。

④ 吳偉明：《易學對德川日本的影響》(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第26—27頁。

⑤ Emanuel Pastreich, “Grappling with Chinese Writing as a Material Language: Ogyū Sorai’s *Yakubunsent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 (2001): 119—170.

⑥ [日]加藤徹：“近世日本における唐音唱詩の興隆と衰退”，《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75 (2014)：97—109。

⑦ [日]古田紹欽：《教育勅語關係資料》(東京：日本大學精神文化研究所，1974)，第10卷，第332頁。

⑧ Judith N. Rabinovitch, “An Introduction to *hentai kambun* (Varian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4 (1996): 98-127. 韓國的“吏讀體”，可謂是朝鮮版的變體漢文。

⑨ [日]聖德太子著，花山信勝註：《法華義疏》(東京：岩波書店，1975)，上卷，第9頁。

⑩ [日]堀保己一編：《群書類從5・系譜部伝部官職部》(東京：續群書類從完成會，1977)，第64卷，第330頁。

構，動詞於名詞之後。“仕奉”來自日式敬語。

變體漢文常見於平安時期的記錄，因此亦稱記錄體。^①平安中期的《日本往生極樂記》、平安後期大江匡房(1041—1111)的《江談抄》以及鎌倉幕府的官式史書《吾妻鏡》與法典《御成敗式目》均用變體漢文。內容雖全是漢字，但中國人亦未必能讀懂。以《江談抄》介紹太子讀書日期為例：“幼主書始是待十二月庚寅日被始事也（意譯：年幼的太子開始讀書的日期，依慣例定在十二月庚寅日）。”^②

日本近世官方文章用的候文亦屬變體漢文。候文在漢字之間加“に、は”等助詞，因在句末使用“候”而得此名。候文多“候”“參”“申”“御座”等日文敬語助動詞。候文成為十分流行的書面語，民間商業通信、日記、記錄均多使用。連1867年末代將軍德川慶喜(1837—1913)在大政奉還的法令亦用候文，例句如下：“舊弊御一洗に付言語の道被洞開候間見込有之向は不拘貴賤無忌憚可致獻言且人才登庸第一之御急務に候故心當之仁有之候者早々可有言上候事。”^③（意譯：舊弊已一洗，言語之道已開。令有志者不拘貴賤，可無懼獻言，人才可登庸。此第一急務也。若知有此等人才，宜速推薦。）候文雖全用漢字，但可以還原成日文。

候文是江戶幕府官方書面語，批評候文形同挑戰幕府權威，因此不同派別的學者對候文並不抗拒。反漢字的賀茂真淵、本居宣長會使用候文寫書信。荻生徂徠雖曾批評變體漢文，認為日本人寫漢文應像中國人般，提出戒用和字、和句及和習，^④可是，其書簡仍用候文寫作，例如《三五要略考》(1721)。

六 和製漢語及熟語

漢字、漢文在日本當地語系化的第五種策略是，和製漢語及和製熟語。和製漢語亦稱國字、倭字、和字或皇朝造字。創作國字是一個十分漫長的歷史過程，官方及民間都有參與。根據《日本書紀》記載，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在“十一年三月丙午、命境部連石積等、更肇俾造新字一部四十四卷”^⑤。四十四卷的數量十分誇張，不必盡信，但當中反映官方在早期造字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日本人創作國字主要是認為現存漢字不足以表達日本的一些特殊語境。日本是島國，因此，魚部的國字特別多。從考古學而言，最早出現的國字是公元8世紀初長屋王(684—729)邸宅遺迹出土木簡中的“鰯”(いわし，沙丁魚)，意即離水即死的魚。^⑥

從平安時期以來，不同時代均出現新的國字；自中世以後，數量更大增，至今共有逾一千五百個國字。^⑦國字以會意及形聲為主，常用例子有“靱”(《古事記》)、“匂”(《萬葉集》)、“禰”(《源氏物語》)、“畑”(平安中期《延喜式》)、“峠”(《太平記》)、“辻”(鎌倉前期《古今著聞集》)、“檉”(室町軍記物語《義經記》)、“畠”(室町時代《貞永式目抄》)、“躰”(戰國隨筆集《躰方明記》)、“働”(德川初期《甲陽軍鑑》)、“凧”(德川中期《凧草紙》)等。部分日本的“品文字”(三疊字)亦是國字，如“崑”(喜的異體字，見《世事百談》，1843)。公元10世紀完成的日本最早漢和字典《新撰字鏡·小學編》收國字四百多個，以魚部為多，共錄二百九十六字；木字旁次之。此外，室町時代的《貞永式目抄》(1232)記曰：“畠之字為日本所作一千餘字之內。”^⑧“千餘字”大概祇是用來表示數量龐

① Judith N. Rabinovitch, “An Introduction to *hentai kambun*: (Varian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4 (1996): 98-127.

② [日]山根對助、後藤昭雄 校註：《江談抄・中外抄・富家語》(東京：岩波書店，1997)，第478頁。

③ [日]在木村毅 編：《明治文化全集・政治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29)，第3卷，第84頁。

④ [日]荻生徂徠：《文戒》，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版(請求記號821-214)。

⑤ [日]坂本太郎 編註：《日本書紀》(東京：岩波書店，1967)，第2冊，第29頁。韓國亦有韓製漢字，稱“韓文漢字”。

⑥ [日]大島正二：《漢字伝来》(東京：岩波書店，2006)，第221頁。

⑦ 《国字の字典》共收一千五百五十一字〔[日]菅原義三 編：《国字の字典》(東京：東京堂，1990)〕。

⑧ [日]環翠軒宗尤：《貞永式目抄》，上卷，第25頁，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電子版(請求記號WA7-177)。

大，而非實數。

日本近世學者開始研究國字。新井白石(1657—1725)是國字研究之祖。他在《同文通考》列出國字共八十一個，以魚(二十五個)、鳥(七個)、木(六個)三類為多。^①他是日本最早將國字定義的人，曰：“國字者，本朝所造，未見異朝之字書。故祇有其訓而無其音。”^②其介紹國字的歷史如下：“本朝文字，白雉年間，儒臣奉勅所撰新字四十四卷。其書泯焉，俗間所用。亦有漢人字書所不載者蓋是國字。世儒概以為偽，非通論也。今定以為國字。”^③他發現不少日本人認為的國字(如勸、觀、樂、兒、單、稻等)其實祇是見諸漢籍的異體字，並非國字。

和算家中根元圭(1662—1773)在《異體字辨》(1692)中列“和俗字”八十九個。國學者伴直方(1790—1842)的《國字考》(1818)、岡本保孝(1797—1878)的《倭字考》(1860)，分別收錄國字一百二十五、一百六十八個。《國字考》考察不同國字的出處，將國字分天地、人倫、衣食、器材、草木、魚鳥、言語七大類。與新井白石不同，伴直方將中日同字異義(國訓)的字亦作國字。德川中期，國學者山本格安的《和字正俗通》先將國字分類(如會意、轉註、假借)，然後按蟲魚草木、禽獸、言辭、器財、地理等範疇加以介紹。他批評貝原益軒(1630—1714)因不懂國字，解說多誤。

和製四字熟語甚多，它們有些像中國的成語，但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卻找不到出處。與國字相同，和製四字熟語亦是經不同時代累積而成。^④常見的例子有，森羅萬象(《日本書紀》)、不老不死(平安後期的寺院史《白山之記》)、一所懸命(鎌倉初期說話集《古事談》及軍記物語《太平記》)、一期一會(戰國時期的《山上宗二記》)、山紫水明(賴山陽稱自己在京都的書齋為“山紫水明處”)等。

和製四字熟語的結構有四種不同形式：其一，將兩組中文詞彙合成。“一所懸命”是日本人將中文本來有的“一所”及“懸命”連在一起。在日本中世，“一所懸命”指武士合力守護其一處領地。室町時代史書《文明一統記》謂，在亂世時，武士們“一所懸命之地被人奪去”。^⑤近世“一所”與同音的“一生”混同，“一所懸命”被解作一生努力，而且出現“一生懸命”的四字熟語。^⑥近世中期以降，使用“一生懸命”日漸普遍，曾使用的文獻有《歷代御記錄》《藤岡屋日記》等。明治以後，“一生懸命”完全取代“一所懸命”。^⑦“一期一會”出自茶道大師千利休(1522—1591)。“一期”本為佛家語，指一世為人，“一會”是常用中文，見面或一刻之意。千利休將兩者合起來。他表示，出席茶會者要抱一生祇有一次的心態，“必須視為一期一度之會，敬畏亭主，切勿世間雜談”。^⑧其二，將中國成語修改而成，意思基本上相同。“七轉八起”來自“七顛八倒”，“森羅萬象”來自“包羅萬象”，“日進月步”來自“日新月異”。其三，日本人自創。“生者必滅”為日本人所創的佛家語，意即活着的人總有死去的一天，來自《平家物語》的“生者必滅，會者定離”。^⑨“四苦八苦”亦來自佛家思想，原指人間痛苦，泛指非常困難、痛苦。南北朝佛教書《存覺法語》已有採用。“滅茶苦茶”是日本人將日語“めちゃくちゃ”用漢字標音而成的和製熟語。最初使用“無茶苦茶”，在近世漸變作“滅茶苦茶”，自此兩語並存。^⑩其四，譯自外來語。“一石二鳥”來自17世紀英國諺語“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中文相近的成語是“一箭雙鵰”。有謂幕末通譯堀達之助(1823—1894)在《英和對譯袖

①②③ 《同文通考》，第4卷，第3—5、1、3頁。

④ 鄭艷飛：《日本漢語に於ける四字熟語化に関する研究：中古・中世の土地所有語彙を軸として》(白百合女子大學博士論文，2014年3月)。

⑤ [日]一條兼良：《文明一統記》，收錄在神宮司廳編：《古事類苑・人部2》(京都：古事類苑刊行會，1914)，第242頁。

⑥ 相傳，戰國大名武田信玄(1521—1573)曾留下名言：“一生懸命出智慧。中途而廢出愚痴。”不過，出處不明，不足為信。

⑦ [日]鳴海伸一：“‘一所懸命’から‘一生懸命’へ”，《国語学研究》46(2007)：130—138。

⑧ [日]山上宗一：《山上宗二記》，收錄在井口海仙編：《茶道全集》(大阪：創元社，1937)，第5卷，第56頁。

⑨ [日]市古貞次校註：《平家物語》(東京：小學館，2007)，第10卷，第205頁。

⑩ [日]田井信之：《日本語の語源：音韻变化論からさぐる》(東京：角川書店，1978)，第292頁。

珍辭書》(俗稱《薩摩辭書》，1862)譯作“一石二鳥”。^①1920年代以來，“一石二鳥”成流行語。1930年代，還衍生出“一石三鳥”及“一石四鳥”。

七 異體字

漢字、漢文在日本當地語系化的第六種策略是，漢字字體的另類寫法(異體字、俗字)。這種異體字數量甚多，在公元5—6世紀的金石文已見“萬”“亼”“囧”“國”“辺”等異體字。^②平安及中世的佛典及漢籍使用大量異體字。日語的異體字在鎌倉及室町時代，已基本上全部出現。^③

日本異體字大多來自漢籍，但亦有和製俗字。現以“國”“蝦”為例看異體字的性質。“國”在日本的異體字有“囧”“国”“囧”“囧”。^④“国”“国”“囧”都是來自中國的異體字。“国”在漢代以來一直有人使用。日本奈良時期的《藤原公真迹屏風帳》寫作“国”。“國”最早見南北朝碑刻，在唐宋以降一直有人使用。安土桃山時期(1573—1603)的《運步色葉集》亦用“国”。“囧”並不常用。平田篤胤著作中有《皇囧制度考》《大扶桑囧考》。“囧”來自中國唐代武則天(624—705)的文字^⑤，但在中國屬罕見，在日本卻一直被使用。近世水戶二代藩主名德川光圀(1628—1701)，國學家有名井上賴圀(1839—1914)。真言宗圀勝寺相傳在公元756年由吉備真備所創立。

作為島國的日本，出現“魚”“蝦”的異體字自然比中國要多。“蝦”的異體字，中日不同。中文異體字有“鰕”“鮓”“蟹”“蝦”，在日本有“蝦”“蟪”“蛭”“鮓”“蝦”“蚶”。平安時期，日本人按蝦的外形造“蝦”。鎌倉時期，日本人以蝦鬚像老翁，改成“蟪”。到近世，日本人將“蟪”簡化成“蛭”。^⑥“鮓”“鰕”沿用中國異體字。“蚶”改自“鮓”。

日本近世是異體字研究的全盛期，代表作為中根元珪(1662—1733)的《異體字辨》(1692)、太宰春臺的《倭楷正訛》(1753)、狩谷掖齋(1775—1835)的《和名類聚抄箋註》(1827)。《異體字辨》首創“異體字”一詞，全書一共收錄五千零二個異體字，提供研究日本中世及近世異體字的重要參考。^⑦近世學者對異體字持不同態度。《倭楷正訛》列二百八十個漢字的正字及其異體字，目的是幫助學楷書者懂得使用正字。春臺在序文中曰：“晚近以來，國字盛行，俗書蜂起，而書法寢廢。……予每見今人所作楷書，惡其無法。因指摘其失之大者，以示兒輩。且告而楷法，暇日輯而錄之，得二百八十餘字，名之曰倭楷正訛。又俗書工有好作奇字異體者，雖非訛舛，然為大雅之累，童子輩不可不戒也。”^⑧《和名類聚抄箋註》研究平安中期辭書《和名類聚抄》中的異體字。掖齋指出，該書多以異體字寫成是有其原因的，反對後人改為正字。他在“凡例”中表明：“此書本文字體悉據京本，其中多用晉唐俗語字……今皆改為正體，欲使人易讀也。但其文字雖涉俗體，義足以取考。箋註已有其說者，皆不改矣。”^⑨

八 舊詞新解

漢字、漢文在日本當地語系化的第七種策略是，舊詞新解。日本人將新義賦予漢字，是為“國

① 參知泉Wiki (<http://www.tisen.jp/tisenwiki/?%B0%EC%C0%D0%C6%F3%C4%BB>)。不過，筆者看畢《英和對譯袖珍辭書》，並未發現該書有此翻譯。

② [日]佐藤喜代治：《漢字百科大事典》(東京：明治書院，1996)，第241—245頁。

③ 何華珍：“俗字在日本的傳播研究”，《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6(2011)：5。

④ 周亞民：“日本江戶初期漢字異體字知識庫的建立”，《臺北大學中文學報》11(2012)：196。

⑤ 《正字通》記曰：“唐武后時，有言國中或者惑也，請以武鎮之。又有言武在口中，與困何異。復改為囧，八方土地。”收錄在《康熙字典·丑集上·口部》(上海：同文書局，1887)，第48頁。

⑥ 有關蝦在日本的文化史，參見[日]酒向昇：《海老》(東京：法政大學出版社，1985)。

⑦ [日]杉本つとむ：《日本文字史の研究》(東京：八坂書房，1998)，第202頁。

⑧ [日]太宰春臺：《倭楷正訛》(大阪：種玉堂，1805)，第4—5頁，早稻田大學圖書館電子版(請求記號子06-00252)。

⑨ [日]狩谷掖齋：《箋註倭名類聚抄》(東京：印刷局，1883)，第1卷，第1頁。

訓”。新井白石在《同文通考》卷四定義如下：“本朝字詁有不與華言同者，即方言也。世儒既以爲乖誤，亦非通論，今定以爲國訓。”^①書中以“拵”爲國訓例子，其中文原意是“插”，日本是“造”之意。

國訓的例子很多。“沖”的中文原意爲被水衝擊，在日本是近岸。“椿”的中文原意爲長壽，日本指山茶花。“井”的中文原意爲投物於井的聲音，日文是蓋飯。“蛸”在中國是一種小蟲，在日本指章魚。“嵐”在中文指山中霧氣，日文變成暴風。“噓”在中文是嘆息，日文是說謊。^②“慫”在中文是才能、鼓勵，或督促之意，日文作回憶。“旬”在中文指十日間，日文是最佳時期。

兩字的國訓亦多。以“勉強”爲例，它在日本近世有三種意思：除與中文原意相同的做不願意的事外（見《草津湯泉遊記》，1781），還指商人減價求售（近世大阪商人用語，現今大阪方言仍保留此用法）、勤奮（見二宮尊德，1787—1856，《報德記》）。明治以後，變爲學習之意（見伊藤博文在1873年給井上馨的信）。

四字成語亦有國訓，多見於日本中世及近世文獻。“朝三暮四”典出《莊子·齊物論》的故事，諷刺祇要改變名目，便能瞞天過海。後來，用來形容主意搖擺不定或反覆無常。辛棄疾（1140—1207）的《洞仙歌·舊交貧賤》有“悠悠今古事，得喪乘除，暮四朝三又何異？”喬吉（1280—1345）的《山坡羊·冬日寫懷》首句是：“朝三暮四，昨非今是。”^③“朝三暮四”在日本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近世它指一整天或生計，例如《孝道故事要略》（1720）記一孝子“其身家貧，失朝三暮四之煙，失其時”^④，文中“朝三暮四”指生計。《江戶名所圖》（1834）謂總泉寺僧人“朝三暮四”學佛，“朝三暮四”指一整天。近代以後，指花言巧語，反而較接近它在中國的原意。《故事俚諺教訓物語》（1913）稱花言巧語的騙人技巧爲“朝三暮四之術”^⑤。

一些中文詞彙在日本出現新的意義。例如，“幕府”在中國原指將軍在戰場的臨時軍營，後亦用於地方軍人及總督的官署。在日本，指將軍府邸及將軍領導的軍政府。^⑥“天命”在日本祇談治權，不涉主權。主權永遠在天皇家，否定中國式或孟子式的易姓革命想法。^⑦

結語

長期以來，日本人使用漢字、讀寫漢文這種形態，很容易被一些學者解讀爲，日本被納入漢語世界，成爲漢字文化圈一員。但是，持此觀點者，祇是看見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面而已。人們容易忽略這樣一個事實，就是日本人使用的漢字、漢文其實已完全被當地語系化了。爲此，歷代日本人先後採取了將漢字作爲日語註音符號、以漢字爲基礎創造假名、日式訓讀、用漢字寫日式漢文、自創漢字及成語、改變漢字的字體、漢字新解等七種策略。這些策略，在奈良及平安時期已出現，經過中世，完成於近世。^⑧因此，日本化的漢字，已成爲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的重要部分；而日本人使用的漢文，也是一種中日混合的文體，與中國的中文差異甚大。從本質上說，如今日本的漢字，不再是從中國輸入的純正文字，而是中日混合的雜種文字。它外表雖像中文，內涵卻多是日本的東西。當然，漢字作爲日本人建立日本語過程中的素材，這也是中國文化在日本文化史一直扮演的角色。

① 《同文通考》，第4卷，第12頁。

② [日]茂呂美耶：《漢字日本》（臺北：麥田出版，2014），第46—47頁。

③④ 方福仁編：《多形式典故詞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513、834頁。

⑤ [日]森脇紫選：《故事俚諺教訓物語》（東京：富田文陽堂，1913），第104頁。其他還有不少中日意義不同的例子。如“一刀兩斷”的中文原意是斷絕關係，日文是下決心處理問題。中世五山文學中已見此四字成語。“七顛八倒”語出《朱子語類》，形容混亂狀態，日文是刻苦抗逆境。禪僧無著道忠（1653—1744）及白隱慧鶴（1686—1769）均曾採用。“落花流水”在中文一般用於慘敗，在日本表示男女情投意合。禪師卍元師蠻（1626—1710）的《延寶傳燈錄》（1678）有用此詞。

⑥⑦ 吳偉明：《德川日本的中國想象：傳說、儒典及詞彙的在地化詮釋》（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第125—126、67—81頁。

⑧ 近代日本人在翻譯西文時創造了新一輪的和製漢字，而且還輸出中國。這方面的相關研究已有很多，非本文研究範圍之內。